

## 《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述

张军委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本文从20世纪前后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历代文人学者对《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况,分析前人时贤研究《左传》行人辞令的重点,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左传》;行人辞令;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60-02

《左传》是一部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著作,它在行人辞令的记录、整理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充分展示了其历史散文著作的艺术魅力。历朝历代对其行人辞令的研究一直延续不断,本文主要从20世纪以前和20世纪以来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历代文人学者对《左传》行人辞令的研究概况。

### 一、20世纪以前的研究概况

对《左传》行人及行人辞令的研究,自古有之。行人,又称“行李”、“行理”,本是由大夫担任的一种专门职业,即现在的外交使节。《周礼·秋官·司寇》载:“大行人,中大夫三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朝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唐代以前对《左传》及其行人的研究,基本上囿于经学范畴。但也有人注意到了行人辞令。《隋书·经籍志》著录《春秋大夫辞》三卷。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说:“齐桓征楚,诘包茅之缺;晋厉伐秦,责萁郤之焚;管仲吕相,奉词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指出了行人辞令一言兴邦的重要作用。《书记篇》中说:“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郑国的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得到诸侯的青睐和重用。又在《才略篇》中说:“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缟棉之肆。蓬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飧,国侨以修辞扞政,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在这里刘勰指出了各国行人所擅长的辞令内容,表明在当时社会中辞令的作用着实不小。在《文心雕龙》中记载了许多行人辞令和与行人辞令有关的内容,刘勰在指出它们的现实价值的同时体味了它们的艺术价值。

唐代学者们从文学角度评点《左传》,从不同方面评价了《左传》的文学特征,指出辞令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对行人辞令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评述。他在《史通·叙事篇》中说:“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指出辞令对于行人大夫的重要意义。在《史通·言语篇》中又说:“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举例说明行人辞令对于邦国的重要性。刘知几又在《史通·申左》篇中指出《左传》中所记载的辞令“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身为史官,刘知几的这些论述很有说服力。刘知几还在《史通·申左篇》中赞叹:“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指出这些言辞皆经过作者的琢磨润色,所以艺术水平极高。

宋代对行人辞令的研究取得很大突破,南宋的陈骥、真德秀从文体角度研究行人辞令取得重大成就。

明代对行人辞令的研究也是注重其文体研究。

清代古文学家们选录《左传》的辞令很多,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选《左传》48篇,他对这48篇的评点,篇篇精彩、句句到位。例如对《烛之武退秦师》的点评:“分明一段写舍郑之无害,一段写陪晋之有害,而其文皆作连锁不断之句,一似读之急不得断者……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他的评点写出了烛之武辞令的实用和美妙之处。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有45篇,《古文渊鉴》有108篇,余诚编著的《古文释义》有40篇,其中大部分是辞令。

清人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也较多。如冯李骅的《左绣》,从“文章”而不是从“经传”的角度论《左传》之文及人物。李文渊的《左传评》三卷,其兄李文藻亲

自校勘。《四库全书提要》对该书的评价是：“《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于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近人吴闿生的《左传微》也是值得一提的著作，正如此书的校注者白兆麟在序言中所云：“此书初稿名《左传文法读本》……而此本‘以文为主’论说文法，讲明义法，要在发明左氏微言。”

总之，20世纪以前的研究尽管规模较小，但取得了一些成就，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二、20世纪以来的研究概况

20世纪以来，学者们才开始真正从文学角度全面认识评价《左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各种文学史的撰写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庆振轩的《中国文学史发展纲要》，罗宗强、陈洪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褚斌杰、谭家健的《先秦文学史》等，都把《左传》置入先秦历史散文的海洋中详加论述。行人辞令作为《左传》语言艺术的典范，备受重视。

### （二）大量论文的撰写

20世纪以来，研究行人辞令的论文日渐增多。如沈松勤的《试论〈左传〉的行人辞令》，归纳出行人辞令的特色分别是以分析利害、揣摩心理、高谈雄辩、微言婉语见长，并指出行人辞令对荀子《议兵篇》、李斯《谏逐客书》以及对汉初政论家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的影响。胡安顺的《〈左传〉辞令与战国策士辞论说方法之比较》指出行人辞令和战国策士辞令的相同点是诱之以利、示之以害、以事为喻、引言说理、举史壮论。陈彦辉的《试论春秋行人的知识结构》一文主要从春秋行人对《诗》、《礼》的掌握和运用，对以《尚书》为核心的历史知识、以《周易》为核心的哲学知识之了解等方面考察，揭示行人在社会动荡、王纲解纽之时得以兴国存邦、抑暴治乱的内在原因。查清兰的《浅析〈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其发展》从春秋“行人”与外交辞令、春秋外交人才的文化素养、春秋外交人才的外交实践三个方面，对《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发展进行了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张高平先生注重对

前人成果的吸收，不仅研究了《左传》的语言学和文字学价值，而且对行人及行人辞令都有独到的见解。

赵逵夫先生在《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中指出，新时期先秦文学的研究第一要有历史的眼光，既要考虑到历史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又要结合考古的成果，对于上古文献中反映的内容，不能轻易否定，先秦文学研究要体现出时间的进程；第二要用文学的眼光，要突破经学思想的束缚、史学的束缚，还要破除成见的束缚；第三要坚持从文学史的事实来揭示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赵先生在另外一篇论文《叔孙豹的辞令、诗学活动与美学精神》中指出，行人辞令是先秦时代具有文体学意义的散文，对后代散文、辞赋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他说：“行人辞令是作者精心撰写的文字，有独立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是完全不同于子书、史书节选的片段的。”这就为我们研究《左传》中的行人及行人辞令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在这篇论文中赵先生还详述了叔孙豹的赋诗、诵诗、引诗活动与其诗学思想，这就为研究先秦行人的个例树立了榜样。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主要对春秋时代辞令的各种文体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论文对先秦各种应用文字从文体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归类，展现了每一种文体的内容结构、风格特点。通过前人时贤的研究使我们重新审视了春秋时代的文体特点，对后世各种文体的来龙去脉更加明晰。另外，李锡澜《委曲婉转、绵里藏针——谈〈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胡安莲《论〈左传〉“行人”及其辞令特色》、王守谦《略论〈左传〉中行人与行人辞令》、陈彦辉《春秋行人形象论析》、王俊《春秋行人辞令研究》等，在各个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时期，行人辞令作为语言艺术受到普遍的重视。

### 三、存在的问题

对《左传》中的行人辞令研究者甚多，成绩也较突出，对《左传》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研究者忽略了对行人本身和行人辞令评点的研究。如果这两点能够认真研究，并放入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深入分析，既可以加深对行人及行人辞令的认识，也可以更好的鉴赏、评点行人辞令。

### 【参考文献】

- [1]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唐·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3]清·金圣叹.金圣叹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4]清·吴闿生.左传微[M].合肥：黄山书社，1995.
- [5]赵逵夫.叔孙豹的辞令、诗学活动与美学精神[J].文学评论，2007，(4).